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 與共產國際 (1924-1932) 研究・檔案

作者——郭 杰 (К. М. Тертицкий)

白安娜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譯者——李隨安・陳進盛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 гг.)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 與共產國際 (1924-1932) 研究・檔案

作者——郭 杰 (К. М. Тертицкий)

白安娜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譯者——李隨安・陳進盛



Тайваньско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24-1932 гг.)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окументы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

郭 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許雪姬、鍾淑敏

主編．-- 臺北市：中研院臺史所，民99.0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78-986-02-3825-9（精裝）

1. 共產黨 2. 共產主義 3. 政治運動 4. 歷史檔案

5. 臺灣

576.332

99010578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

原 著	郭 杰、白安娜
譯 者	李隨安、陳進盛
主 編	許雪姬、鍾淑敏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02) 2652-5388 傳真：(02) 2788-1956
劃撥帳號	17308795
製版印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健康路130號7樓之11 電話：(02) 2226-9120
定 價	600元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ISBN	: 978-986-02-3825-9
GPN	: 1009901417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許序

知道郭杰（К. М. Тертицкий）與白安娜（А. Э. Белокурова）教授合作完成俄文的《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一書，是來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余敏玲告知。這是 2005 年，亦即書出版的那年。經由余敏玲的介紹，得知此書利用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收藏，過去未曾有人使用過有關臺灣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第三國際）之俄文、英文檔案寫成，而書的後半部還附了 67 件原始檔案，對臺灣史學界而言可謂一大喜訊。

有關臺灣共產黨的研究，雖有盧修一《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簡炯仁《臺灣共產主義運動史》開其端，而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踵繼其後，近幾年來中國亦有關臺共的研究如早期有黃彪、楊錦和、王炳南、許偉等著〈翁澤生〉（收於《中共黨史人物傳》），何池《翁澤生傳》。此外謝雪紅《我的半生記》；楊克煌《我的回憶》；蘇新《未歸的臺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莊春火的回憶錄、受訪紀錄等臺共黨人的回憶錄；還包括 2003 年白安娜在國立政治大學的碩士論文“The Taiwa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Comintern (1928-1931)”。雖然有以上的研究與回憶錄，但有關臺共的研究一直沒有深入了解臺共與促成其成立之第三國際間的關係，尤其是遠東局人員如何和臺共人員聯繫。而翁澤生是否如陳芳明的研究指出，以中共（兼臺共）的身分，把持臺共和第三國際交通的管道，進而影響第三國際按照其意利用王萬得等人成立「改革同盟」鬥爭謝雪紅；也因改革同盟和翁、共產國際誤認 1930 年霧社事件的發生，是革命情勢大好，因而指示臺共大肆活動，終為臺灣總督府一網打盡。

由於我不懂俄文，無法進一步了解書的內容，遂決定要將其翻譯成中文，以嘉惠對臺共有興趣的研究者，也方便我閱讀。

想翻譯此書成中文，我不是第一個，臺共中央委員兼書記、後來不知所終的林木順之侄林炳炎，也想斥資請人翻譯，因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已有翻譯之意，乃將此工作放心地交給臺史所；而自 2005 年決定翻譯，一直到 2010 年才得以出版，這之間的困難，難以一言道盡。

在余敏玲協助下，敦請中國黑龍江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隨安教授翻譯書中的俄文，臺史所又請到陳進盛為附錄中的英文文件翻譯。翻譯結束後，俄譯及

英譯的中文再寄給原作者郭杰教授審訂，他為本書做了某些修訂，並在書的〈後記〉加上第二部分，專門為在臺灣的中文版讀者而作。詳細告訴我們，此書出版後，已有兩位學者分別寫了書評，一是德國柏林 Humboldt University 的 Karin-Irene Eiermann 教授，二是美國哥倫布市 Capital University 的 A. V. Pantsov 教授的評論及他的回應。中譯本初稿，原作者修訂稿完成於 2008 年 12 月。

在此還要提一筆，就是要翻譯這本書，以及使用這本書後半（附錄）的文件，先由余敏玲代為取得作者郭杰教授、俄文版出書的書局，以及位於莫斯科之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館長的同意。2007 年本人與副所長鍾淑敏、編審王麗蕉，在余敏玲率領下赴俄羅斯，本欲與郭杰教授見面，他卻因家事離開莫斯科以致緣慳一面，無法當面向他致謝。不過倒是到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親自向 K. Anderson 館長致謝，並看該館所藏檔案。此次俄羅斯之行，我帶著本書翻譯稿隨行，在旅途中將初稿看完，發現譯稿中有如下的問題：

1. 李隨安教授的譯筆流暢易懂，但有一些用語和臺灣不同，必須加以修訂，尤其是專有名詞由日文譯為俄文，再由俄文轉譯為中文時的落差。
2. 郭杰教授本人懂中文，因而引用不少中文著作，在使用引文時，必得找到原書，再將李譯的文稿予以還原，如引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文譯本，或謝雪紅《我的半生記》、楊克煌《我的回憶》。
3. 附錄中的文件，有由中文俄譯、英譯的檔案，原是同一檔案，因而翻譯略有不同，是否要讓俄文、英文的檔案譯成中文時具一致性。
4. 不少註解的出版資訊不足，是否要予以補足？在臺灣出版的書容易解決，但在中國大陸及俄羅斯出版的書則沒有把握。
5. 原書有些小錯誤，是否就在中文本時加以訂正？

有上述的問題要解決，因此必須和郭杰教授聯繫，這部分的工作就由副所長鍾淑敏擔任，來來回回也不知訂正多少次，離開譯者李教授初步譯完時已經過兩年，李教授不時來關心，說松花江已經結冰兩次了，怎麼到如今尚未出版，我們只能汗顏以對。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是學術研究機構，但又是一個「出版社」，卻沒有「職業」主編，都由所裏的研究人員輪流充當，又多受研究工作所限，無法專心編書，以致工作斷斷續續。

終於這本書似乎在 2009 年中可以出版的樣子，原本想與遠流出版社合作，但那是兩年前講好的，我們拖沓了這許久，最終決定由自家「出版社」出版。先行排版，再由鍾副所長詳細校對本書的引文，做了一、二校，再由本人接手三校，並配上相關圖片。由於尚有些中譯仍覺有問題，我們又挑出一些問題向余敏玲請教。好在她好人做到底，不厭其煩地再幫我們校訂有疑點的地方，這本書從引進到譯文定稿，都有余敏玲的參與，特別謝謝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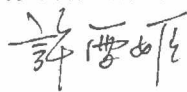
我在 2008 年寫成〈日治時期左翼人物與戰後白色恐怖之間的相關性〉一文，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臺共，得到本書的助益相當多。就我閱看這本書，實具有以下的貢獻：這是第一本使用共產國際和臺共聯繫檔案而出版的論文，因而能闡明共產國際成立（1921）到結束（1943），其中駐上海遠東局人員和臺灣人之間接觸的點滴。第二，證實陳芳明教授合理推測翁澤生壟斷了臺共和共產國際的聯絡，且為遠東局工作，並利用此機會依照己意，讓遠東局順其看法對臺共下指示，向所謂「機會主義者」謝雪紅奪權，並進入激烈活動期，招致臺共暴露，終至 1931 年大半的臺共被捕，且大部分在獄中做了轉向，這是相當重要的陳述。第三，對臺共人物的描述比過去有關臺共的介紹要深入不少，如劉纘周、趙從錫、趙清雲，尤其是後兩者。第四，證明臺共在第三國際之下，是接受日共指揮，成為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只因日共忙於選舉，及遭到日本政府逮捕，因此轉由中共協助；而非臺共直接由中共指揮。第五，日共對臺灣是否獨立，黨員間也有不同的看法。後來轉向、與臺共關係密切的日共佐野學，則不認為臺灣應獨立，而是在日本國（包括日本所有殖民地）內的共產黨結合在一起，這也是前人所未曾提出的。

如果要說本書有些不足，或者有哪些資料沒看，則為日本外交史料館中的共產黨關係檔案，以及臺灣人關係雜件，另楊春松的兒子楊國光寫的《ある台湾人の軌跡：楊春松とその時代》未使用。不過，上述資料有些也收錄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而為作者使用。又本書在 2005 年出版後，何池又寫了《中國共產黨指導臺灣革命研究》一書，但未用到任何俄國檔案。2007 年廈門大學的《臺灣研究集刊》也刊登宋幫強〈臺灣共產黨成立之研究〉一文，但宋文只提到臺共成立即不再往下說。又，2009 年陳芳明教授在《謝雪紅評傳》中，將《我的半生記》、《我的回憶》中的資料補入，由麥田出版社重刊，使其論點證據更足。在本

書出版前夕，我顧慮到中文讀者對本書的內容背景認識不足，乃商請陳教授寫導讀。我等了又等，半年後（2009年10月）終於完成了，但這完全沒有影響到出版，因為我和鍾副所長，又陷入漫長的校讀工作中。她在將《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的下冊處理完，我在校對完《黃旺成先生日記》（三）、（四）、（五），《灌園先生日記》（十七）、（十八）後才有餘力處理本書。陳教授和鍾副所長的努力配合，令人感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是一個年輕的所，臺灣歷史這個學門也才問世於一、二十年前，做為臺灣史的研究者，除了史才、史德外，我們需要更多的是「史料」。因此，臺史所同仁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餘，也努力編輯、出版史料，採集口述歷史，翻譯外文史料、著作。但盼本所的努力，能為臺灣史的研究做奠基的工作，使臺灣史研究更為茁壯。謹為之序。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2010.4.14

附記：

本書的出版，我要特別謝謝郭杰、白安娜教授，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館長 K. Anderson。譯者李隨安教授、陳進盛先生。鍾淑敏副所長，王麗蕉館主任，黃燕秋、劉鴻德、張雅惠等助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副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陳芳明教授，以及一直為此書催生的林炳炎先生。

陳序

左翼史的解密與解謎：

序《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

蘇聯體制的瓦解，使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相關的秘密檔案得以重見天日。作為第三國際重鎮的莫斯科，從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曾經密集訓練來自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員。在北國寒地的赤都，並非只是掌握蘇聯版圖的權力中心，同時也是支援並支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中心。位於莫斯科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接受來自中國、日本、朝鮮、臺灣的左翼運動者。幾乎每位留學生在那裏完成訓練之後，回到各自國家都成為出色的共產黨員。這些黨員的早期左翼經驗，都在莫斯科留下豐富精彩的歷史記憶。這些記憶還猶待挖掘，足可填補左翼史研究中的缺口。

比起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位階更高之第三國際（正式名稱是共產國際）總部，在 1943 年解散之前，始終是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指導機構。每個國家共產黨的政治綱領、運動策略與行動主張，都必須接受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總部的指導。尤其是殖民地的左翼革命運動，能夠在最短期間提出最迅速的行動綱領，背後都有來自莫斯科提供的思想方針與運動方向。與此領導結構相關的重要政治文件，都收藏在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中。如今由於全新史料的開啟，許多舊有的歷史解釋都必須翻新。至少對於日據時期臺灣左翼運動史而言，這批史料的公布確實帶來許多前所未見的視野。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一書，係由俄國學者郭杰（К. М. Тертицкий）與白安娜（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合著。他們以共產國際珍藏的歷史檔案為基礎，對日據臺灣共產黨的始末重新考察。其中揭露許多史實，比起日本的警察檔案還要豐富。過去的臺共史研究，基本上依賴兩份重要史料，一是 1939 年由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的「第三章共產主義運動」，一是 1971 年山邊健太郎編輯的《現代史資料》第 22 冊所收「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東京特別支部員檢舉顛末」。這兩份史料都是日本警察在逮捕之後取得的相關文件與口供，因此無法獲得更接近真相的事實。

解嚴之後的臺灣，有關左翼史料的挖掘仍然有限；而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

對於臺灣左翼運動者的檔案文件也諱莫如深。這是因為臺灣一直停留在反共的思維，而中國則加速朝向資本主義體制發展，使左翼史的開發不能不陷於停頓。我在1991年完成《謝雪紅評傳：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並於1998年出版《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便開始期待有更重要的史料能夠出土問世，讓臺共運動史的研究可以獲得更進一步的突破。

這樣的期待，必須在世紀末與世紀初才得到部分實現。1997年，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的《我的半生記》在臺灣出版，2005年楊克煌遺稿《我的回憶》也正式問世。這兩本專書係由楊克煌女兒楊翠華自北京攜回，經過整理後，以私人名義出版。雖是屬於回憶錄作品，對日據時期臺共史的理解帶來極大突破。其中關於臺共內部的人事糾葛與派系鬥爭，提出相當明確的細節說明，使過去研究中遭遇的疑惑都得以釐清。例如臺共在1928年4月15日建黨儀式進行時，中共曾派代表「彭榮」來參加。有關彭榮的身分，歷來有各種推測與猜疑，謝雪紅在回憶錄終於證明彭榮便是彭湃的化名。¹《我的半生記》與《我的回憶》的最大突破，便是使左翼史研究完全擺脫臺灣總督府的官方解釋，讓當時的歷史參與者以現身說法重建更接近事實的記憶。

謝雪紅、楊克煌的專書出版之後，一份更為重要的史料終於到達臺灣。《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的中譯，應可視為左翼史研究的重要轉折。這本書運用的檔案文件，都是過去臺共相關議題的探索過程中未嘗有過的接觸。共產國際的檔案大都是以俄文書寫，由於未曾公開，也未經中譯，因此對於外界研究者都是呈封鎖狀態。遠在東亞太平洋臺灣小島的左翼運動，往往是被忽視的對象，尤其夾在中共與日共兩股大歷史之間，臺共的存在可謂微乎其微。真正受到注意的，往往是偏向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到目前為止頗受注意的兩本書，一是郭恆鈺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這冊書僅寫到1927年國共分裂為止；一是張秋實的《瞿秋白與共產國際》（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此書終止於1931年瞿秋白被逐出中共中央領導。中共在建黨初期一直到毛澤東掌握黨中央之前，在政治策略上始終受命於共產國際，郭恆鈺的專書所討論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正

¹ 編者按：有關彭榮的身分，陳芳明教授之看法與本書作者有所不同，詳請參考本書頁69。

是印證這個事實。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在 1929 至 1931 年採取激進的城市暴動路線，背後也受到共產國際的指揮。瞿秋白極左路線的錯誤，證明共產國際過高估計中國革命的可能性。莫斯科認為 1929 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爆發，是資本主義瀕於崩潰的徵兆，遂鼓動各國共產黨必須展開革命行動。

謝雪紅是由共產國際直接訓練而成的臺共黨員，這項資歷使她在臺灣成為理所當然的領導者。遠在臺灣，謝雪紅在困難的政治環境下企圖重建與共產國際的連繫。依照當時的規定，臺共係接受日共的指導。因為共產國際通過的「一九二七綱領」，明確規定一國一黨的原則。臺灣既然屬於日本殖民地，則臺共就隸屬於日共的指揮。臺共的正式名稱「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便是由此而來。然而，臺共建黨之前，日共早已遭到警察的徹底破壞，沒有餘力領導臺共，這說明了臺共建黨時改派中共代表彭榮來致詞，原因就在於此。謝雪紅在臺灣領導黨中央時，不能不通過上海的第三國際代表瞿秋白與莫斯科連繫。謝雪紅與瞿秋白之間的聯絡人，是具有臺共與中共雙重黨籍身分的翁澤生。共產國際與臺共的整個聯繫系統，關鍵角色就落在翁澤生身上。在上海大學時期，瞿秋白與翁澤生就已建立密切的師生關係，如今兩人又成為第三國際在上海的傳話人。莫斯科與臺灣的信息傳達，瞿、翁是最重要的中繼站。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這本書，最令人矚目之處，便是揭開翁澤生與莫斯科長期聯絡的重要文件。解讀文件的內容，立即可以發現翁澤生不僅介入臺共內部的派系鬥爭，並且也清楚看到他持續傳達偏頗的消息給莫斯科。更令人訝異的，便是翁澤生以共產國際的權威對島內臺共下指導棋。因此，這份研究的重大貢獻，便是根據第一手史料，首度讓臺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互動完全釐清。最新出版的何池著《翁澤生傳》（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隻字未提翁澤生提供給第三國際遠東局的任何書信檔案，而是完全從中共立場來評斷臺共的功過得失。這個事實更加顯示，共產國際檔案的公布，對於臺灣左翼史的研究確實帶來撥雲見日的效應。

謝雪紅在 1930 年面對黨內的派系鬥爭時，從來不知道翁澤生傳遞給第三國際的負面消息，當然也不知道反謝雪紅的黨內派系已經成立「改革同盟」。包括王萬得、潘欽信、蘇新、蕭來福在內的反謝派，都認為第三國際支持他們在黨內另組

同盟宗派。謝雪紅不斷派人到上海企圖與第三國際聯絡，為的是企圖挽救臺共所遭逢的危機。但是，凡是到達上海的臺共代表林日高、陳德興與劉纘周，可能都與翁澤生見面。在整個臺共的權力結構中，能夠既熟悉臺共狀況、中共對策以及第三國際的態度者，唯翁澤生而已。1930 年以後，謝雪紅全然陷入孤立狀態，日共支援已經切斷，中共則支持翁澤生，第三國際也相信翁澤生。因此，謝雪紅終於面臨眾叛親離的下場，不僅被摘除黨主席的地位，甚至還遭到開除黨籍的命運。

這本書所提供的第三國際檔案，始於 1930 年的黨內鬥爭，止於 1931 年的臺共覆亡，也正是臺共處於關鍵時期的重要史料。在此文獻基礎上所提出的解釋，頗能說服讀者。本書的兩位作者，對於前此臺共研究的相關專書都已有過涉獵，包括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盧修一的《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更重要的是，他們還細讀莫斯科所藏的中共、日共檔案涉及臺灣議題的文件，因此提出的見解與判斷都有過人之處。

作者特別強調，謝雪紅在 1931 年初，就已經懷疑翁澤生的可疑身分。凡是她派去上海的臺共代表，翁澤生往往會引領他們與瞿秋白見面。由於瞿秋白曾經領導中共，同時又兼具第三國際代表的角色，來自臺灣的黨員莫不感到信服。我在撰寫《謝雪紅評傳》時便已指出，翁澤生不斷宣稱「共產國際委託中共來領導臺共」的說法，極為可疑。這是因為瞿秋白在 1931 年就已經失去中共領導的地位，並且也喪失國際代表的身分。毫無領導權的瞿秋白，竟然在 1931 年以後藉著共產國際與中共的名義指揮臺共，其中必然有人從中操弄。這本書的作者明確指出，莫斯科內部文件證實瞿秋白在這段時期已經失勢。歷史事實證明，「中共領導臺共」的說法全然沒有任何憑據。

書中公布的 67 件檔案，其中就有 43 件係由翁澤生寫信給共產國際的信件。在瞿秋白失勢後，僅剩下翁澤生與遠東局聯絡。在遙遠的莫斯科決策者，對於臺共的動態全然依賴這條單線的連繫。事實至此更加明朗，共產國際對臺共的任何回應與指導，其實都只是與翁澤生一個人對話。翁澤生轉達共產國際給臺共時，自然就不免加入他個人的主觀意願與判斷。臺共內部的改革同盟能夠順利成立，並成功地向謝雪紅奪權，翁澤生所佔據的位置誠然不容忽視。如果「中共領導臺共」的說法可以接受，則臺共的潰敗，中共也必須負起責任，而不是單方面只對歷史上的謝雪紅進行持續譴責。

誠如本書作者所說，臺灣總督府編纂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引述的瞿秋白與翁澤生談話，與實際發生的事實頗有落差。畢竟日本警察取得的資料，是來自臺共黨員被捕以後的口供，而不是根據當時的文件原版。在比對所有的史料證據後，作者說：「所有這一切使我們有理由確信：翁澤生在闡釋事情的過程和與瞿秋白談話的內容時，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的；他添加了一種含義，這種含義無論是他的交談者、還是遠東局都沒有表達過。同時，無論是翁澤生本人，還是根據他的提議被派往臺灣的陳德興、潘欽信，在黨內鬥爭中都積極地運用了自己對與瞿秋白談話的闡釋。」作者更進一步說：「現有的資訊讓我們得出這一結論：翁澤生利用潘欽信和陳德興的上海之行，來推動臺共領導人的更換和臺灣共產黨的改革。」

臺共史的研究長期以來受到侷限，一方面是因為臺灣總督府的官方檔案規範了歷史視野，一方面則是由於戰後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不斷提出負面的解釋，同時史料又一直被禁錮封鎖，遂阻礙後人對事實的認識。現在這部重要的著作，既有豐富的史料，又有縝密的研究，使過去遺留下來的疑惑終於獲得廓清。從俄文翻譯過來的這部著作，已經解決許多基本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臺共史的研究已經到達終點，所有的歷史謎底已經揭開。恰恰相反，這本著作代表的是一個研究新起點，當俄國全面公開史料之際，國民黨也應該卸下長久以來的反共包袱，中共也應該卸下「領導臺共」的迷思，容許相關檔案、文件、自傳能夠公諸於世。早期臺共黨員如王萬得、蕭來福、潘欽信、詹以昌，在 1949 年以後也留下大量的歷史紀錄，至於謝雪紅、楊克煌的個人書信筆記，也還在塵封狀態。他們的史料一旦揭開，臺灣左翼運動史的詮釋必將全面刷新。至於國民黨在逮捕蔡孝乾、張志忠之後取得的口供資料，一旦能夠提供研究者閱讀，當可使陳舊的史觀得到翻轉。《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在新世紀的出版，確實為研究者攜來全新的刺激與想像，對國內學界而言，歷史大門已經重新開啟。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芳明

2009.10.26

原書內容提要

本書是俄羅斯出版的第一部關於臺灣共產主義地下組織及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之著作。本書包含兩個部分：對這個課題的基本研究；關於臺灣共產主義運動的檔案文獻（以前未曾公布過；收藏於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

中文版序

在這部著作中發表的文件，漫長的時間裏，都被保存在莫斯科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中央黨務檔案館。在 1990 年代以前，不管是對外國人、還是對蘇聯研究者皆不開放。對這些檔案進行研究的時候，我們把這些檔案資料與已經發布的日本警方的文件、臺灣共產主義者的回憶錄加以比對。

我們感到高興的是，我們的著作將在臺灣出版，在那裏，曾經發生了這本書描述的主要事件；在那裏，現在生活著這些事件的參加者以及目擊者們的後代；在那裏，這本書對歷史學家們可能會有助益——這正是我們所期望的。在研究檔案文件的過程中，我們時時關注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不只是關於臺灣共產主義運動的論文、著作，還有關於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史其他方面的論文、著作。

我們請求你們考慮以下情況：本書起初是為俄羅斯讀者寫的，書中對有些事物作了詳細解說，這對臺灣讀者來說當然沒有必要。另外，我們的視角和分析邏輯對於你們可能是不習慣的。然而，在準備本書的中文版時，我們放棄了對原書加以根本改寫的想法，因為這樣做就好像在寫另一本書了。在本書的翻譯過程中，我們僅僅消除了一些存在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大的更正和增補，還更換了幾個段落。本書的〈後記〉也增加了續篇，其中主要是增補的相關資訊，包括近年來發現或發表的關於臺灣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

我們的著作能在臺灣出版，是由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博士、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博士的倡議；李隨安先生、陳進盛先生的翻譯工作；以

及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鍾淑敏、檔案館主任王麗蕉、出版編輯室的劉鴻德和張雅惠，以及諸位助理吳漪琳、黃燕秋、陳世芳、郭立婷、吳慧婷、蔡說麗和柯安娜等人，耐心仔細地投入還原大量引文、編輯和校對的工作。在此，謹向他們致以最高的謝忱。

郭 杰 (К. М. Тertiцкий)

白安娜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2007 年 7 月

序 言

共產國際與臺灣

「耶穌會士到處都有」，人們談起他們的……。的確如此。他們到處都有，但是並不是隨便哪個地方都有。

耶穌網站
「我們從事什麼」欄目

在共產國際文檔的廢墟中，至今還隱藏著許多有趣的東西。1920-1930 年代，共產國際及其政黨的網絡在廣袤的區域鋪開，從挪威的海灣到南非的礦山，從中美洲的小城到法屬印度支那的稻田。但是，共產國際及其各個政黨的歷史仍然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對於那些曾經活動於共產主義運動主幹線路周邊的政黨來說，更是如此。

臺灣共產黨就屬於這類政黨。由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很長的時期裏，在臺灣島內幾乎不可能客觀地描述臺灣共產黨；而在島外，這個政黨又難得進入研究者的視野。當形勢變化之後，關注這個課題的歷史學家又面臨巨大的困難：歷史資料的明顯不足。然而，在最近 10 年出現了這樣的可能，即：參照原先共產國際的秘密檔案，將那裏的資料與日本警察部門擁有的檔案和 1990 年代出版的臺灣共產主義者的回憶錄加以比較，構建出對發生過的事件比較詳細的描述。我們所努力去做的，正是這件事。

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探究臺灣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日本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使我們有可能明瞭臺灣共產黨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它能在相當嚴酷的警察制度下存在幾年，它使用什麼方式以二、三十個成員操縱數百個人，黨內鬥爭是如何進行的，以及這一鬥爭如何導致黨的滅亡。

關於臺灣共產黨，俄羅斯過去實際上無人問津。應該說，對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我們俄羅斯總的來說，所知甚少。由於這個緣故，我們的著作在開頭介紹了那個時期臺灣的基本情況，然後發布臺灣共產黨的歷史概要和關於黨的活動的檔案，這些檔案包括黨綱的正文、為在共產國際機構裏的臺灣共產主義者擬寫的信

件、臺灣共產黨積極分子的報告，以及其他一些涉及臺灣共產主義運動的資料。

在寫作這部著作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朋友和同事的幫助。我們特別感謝國立莫斯科大學亞非國家研究所和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它們從一開始就支援這個項目。沒有 V. N. 舍佩列娃、S. M. 羅森塔爾、Yu. T. 圖托欽的幫助和指教，我們這部書的許多地方難以下筆。在解決一系列重要問題的過程中，還有下列人士幫助了我們：M. Yu. 索羅金娜，I. V. 坎托羅維奇，德拉伊布魯特，K. V. 安東尼揚，N. 波德戈爾尼克，L. 陳，N. V. 斯科爾雷金娜，E. V. 沃爾奇科娃，I. J. 科扎諾夫斯卡婭，F. K. 捷爾捷茨基。為此，我們對他們深表謝意。

郭 杰 (К. М. Тертицкий)

白安娜 (А. Э. Белогурова)

臺北－莫斯科

2002-2005

編輯說明及凡例

《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之刊行，為本所數位典藏計畫之成果。原書以俄文、英文撰寫而成，本書的翻譯工作，俄文部分由李隨安、英文部分由陳進盛擔任。翻譯初稿完成後，作者郭杰（Konstantin Tertitski）、白安娜（Anna Belogurova）逐一校訂，並且為中文版更動部分內容。本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由數典計畫主持人許雪姬、共同主持人鍾淑敏擔任主編，協同主持人檔案館主任王麗蕉負責整體行政支援與人力調度，初期的編輯業務也由數典計畫支援。包括黃燕秋協助連繫工作，吳漪琳、蔡說麗負責編排、核對書目資料，吳慧婷協助徵引圖書的借調，郭立婷、陳世芳核對引用資料內容等。至於俄文資料，則委請莫斯科大學亞非研究所的柯安娜協助。及至內容確定，工作由本所編輯室承接，張雅惠與劉鴻德擔負全責。在封面設計及美編方面，本所副所長詹素娟鼎力相助。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余敏玲則對書名、俄文書目、索引名詞作最後的確認。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作者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選自原藏於俄羅斯國立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的 67 份檔案文件。關於本書之內容與編輯方式，說明如下：

- 一、作者為因應中文版的出版，將內容做了部分修訂，因此本書與原書有若干差異。
- 二、本書的注釋以兩種符號標示，以阿拉伯數字標示引用文獻的腳注編號，以數字一、二、三表示作者於章節之後補充說明的編號。
- 三、本書「研究」部分隨文收錄 8 張人物圖像，除了 L. G. 沃倫斯卡婭與趙清雲乃據俄文原書照錄，其餘 6 張為中文版所新增。
- 四、本書中（ ）為作者或檔案文件的製作者所加，例如：I. A. 雷利斯基（遠東局領導人）；〔 〕為譯者為了幫助理解而加，例如臺灣〔共產〕黨；【 】部分為編輯所做的修訂，如：臺灣大學【臺北帝國大學】。
- 五、檔案部分的 67 份文件中，有的句子或段落加了底線或雙底線，為檔案本身所有。